

主恢复召会生活的简史

召会生活恢复的开始

主使用路德马丁(Martin Luther)开始祂的恢复，但是路德没有作任何事以恢复召会生活，反而他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协助成立了国教。路德开始改教约两个世纪之后，主在一七二〇年代兴起了摩尔维亚弟兄们(Moravian Brethren)。当时摩尔维亚和波希米亚(Bohemia)几个团体的信徒逃离逼迫，定居在新生铎夫伯爵(Count Zinzendorf)在德国的领地，开始恢复召会生活。卫斯理约翰(John Wesley)自述他在一七三〇年代开始尽职时，从这班摩尔维亚弟兄们得着了许多帮助。他甚至去到德国与他们同住，并说若不是自己对英国有很重的负担，就会留在那里与他们一起，享受他们召会生活的实行。卫斯理回到英国后，藉由他的帮助，在英国有一次大复兴。

在新生铎夫的带领之下，召会生活的恢复在摩尔维亚弟兄们中间有一个好的开始；但这还不是完满的恢复。因此一个世纪之后，约在一八二五年，主在英国兴起了普利茅斯的弟兄们(Plymouth Brethren)，进一步恢复召会生活。一位名叫达秘(John Nelson Darby)的年轻英国圣公会牧师，参加弟兄们的一场小型聚会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；他受吸引到一个地步，离开圣公会，加入弟兄们。他后来成了弟兄们聚集当中的领头人之一。普利茅斯弟兄们拒绝圣品阶级与平信徒制度，也拒绝其他已经进到组织化基督教里的堕落元素。他们早年召会生活的实行相当美好，甚至可以视为非拉铁非召会这豫言性表号的应验。(启三7~13。)然而过了不久，他们对于正确领会圣经中一些事物有不同的观念，因而带进分裂。主使用弟兄们恢复了许多真理。圣经藉由路德马丁『重见天日』，但直到主兴起弟兄会的教师，圣经才得着解开。今天基要派神学大部分的真理，都是弟兄们率先恢复的。举例来说，司可福(C. I. Scofield)的教训很有影响力，这些教训几乎完全取自弟兄们的教义。司可福惟独没有接受弟兄们实行召会生活的路。因此，弟兄们所恢复的真理对基督教有重大的影响。

然而因着弟兄们强调圣经中的真理，他们对于某些事，如主的再来等，就陷入许多道理上的争执。达秘和另一位领头的教师牛顿(BenjaminNewton)之间出现一些道理上的歧见，于是达秘说服其他人革除了牛顿。那是弟兄们中间分裂的开始。弟兄们中有位弟兄名叫慕勒(GeorgeMuller)，以其信心闻名。他凭信开办孤儿院，全然信靠主供应财物的需要。他对主有很深的认识，但在是否接纳教导错误道理之团体的信徒上，不同意达秘的看法。达秘坚持要将这样的人从交通中革除，但慕勒接纳所有的真信徒，不论他们是否与被视为错误的团体有牵连。至终这个争议带进了弟兄们中间第二次大分裂。多数人跟随达秘，成为所谓的闭关弟兄会。那些跟随慕勒的人则被称为公开弟兄会。二十世纪初所作的统计显示，弟兄会出现不过九十年后，就有超过一百个分裂。

主的恢复在中国的开始

十九世纪初叶起，福音在中国广传。当时许多大型差会都在中国成立。南浸信会差遣了一批传教士到中国，主要是来到我的家乡山东省。我母亲的祖父全家在十九世纪后半成了南浸信会的基督徒。我的母亲当时还年轻，在南浸信会所办的学校就读。那时中国最兴旺的差会是戴德生(HudsonTaylor)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。基督教宣道会也在吴伯瑞(Woodbury)这位在主里很深的弟兄带领下，差遣了大批的传教士。虽然数以百计的传教士从欧洲和美国受差派前来，但守旧的中国人却自认有孔子传下来最好的教训以及最高的文化。他们认为中国人以外的人都是次等蛮夷，当传教士来到中国，有学问的中国人拒绝听他们所说的。他们称传教士『洋鬼子』，也瞧不起任何接受传教士传讲的中国人。由于我的母亲成了基督徒，在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乱期间，她被迫逃到山上躲避逼迫；那是我出生以前几年的事。因着传教士无法接触有学问的中国人，他们接触的大部分是未受教育、贫穷的劳工阶级。传教士提供中国人金钱、食物、医药方面的协助，更得罪这班有学问的人，因为他们觉得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一种羞辱。传教士觉得有学问的中国人太过骄傲，有学问的中国人认为传教士肤浅、崇尚物质；彼此之间有一道鸿沟。

拳匪之乱造成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被杀害。他们的殉道致使英国许多信徒开始迫切的为中国祷告。毫无疑问，主答应了这个祷告，因为在一九二〇年左右，主行了奇妙的事，在中国各地都得着青年人。在一九二〇年得救的人中间，有一位中学生名叫倪柝声。我则是于一九二五年读专科学校时得救的。倪柝声得救后不久，就接触到一位名叫和受恩(Margaret Barber)的传教士。和教士年轻时就受差遣到了中国，但因着一位妒忌她的同工诬告她，她差会的董事会就将她召回英国。她在那种情形中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不为自己表白。当时她藉由『黎明报』杂志(The Dawn)发行人潘汤(D. M. Pantou)的帮助，得着许多亮光。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，差会董事会的主席发觉和教士在被指控的事上是清白的，就表示愿意差遣她回中国，但和教士选择退出差会。然而，她有负担以个人名义回到中国，于是藉由潘汤弟兄的团体在财务上的帮助，她得以成行。和教士余生都留在中国。在我们的诗歌本中有几首诗歌是她所写的。这些诗歌表明她对基督、那灵、和生命认识至深。倪弟兄年幼初信主时，和教士给他许多属灵的帮助。在她的推荐下，倪弟兄阅读了潘汤'郭维德(Robert Govett)、彭伯(G. H. Pember)、宾路易师母(Jessie Penn Lewis)'史百克(T. Austin Sparks)和其他人的属灵书报。大约在八年之内，弟兄收集并读遍大约三千本基督徒经典著作，从第一世纪教父直到近代的著作，包括传记、召会历史、和大作家的解经。他很有学习，得救不到两年，就开始写属灵单张。一九二二年，他和其他几个人开始聚集，在家中擘饼。那是主当前恢复中地方召会的头一次聚会。

一九二五年，倪弟兄不过二十三岁，就开始出版一分名为『基督徒报』的月刊。接下来的两年，他出了二十四期基督徒报，每期约含八十页。他在这分刊物里讲解了圣经中几处关键的段落，包括启示录二至三章主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。藉由解开那七封书信，他暴露了天主教和更正教各公会的错误。倪弟兄借着他在『基督徒报』的文章，在中国各处激动了许多青年信徒。至终数以千计的信徒，包括我在内，订阅这分刊物，我欣赏他的著作到了极点。一九二六年底，倪弟兄将出版工作从他的故乡福州移到上海，因为上海是远东的大商港，拥有许多现代的便利设施，乃是战略中心。大约同时，上海召会开始在一位姐妹家中聚会。

一九二八年，倪弟兄出版了三册『属灵人』；此书写于他约二十七岁患重病之时。倪弟兄写完『属灵人』之后，以为自己快要死了。然而，他得了信心，主行神迹医治了他。到一九三〇年，他也已将许多最属灵的英文诗歌翻成了中文。李弟兄与倪弟兄起初的接触我生于基督教，是第四代的基督徒。我曾就读于南浸信会的小学，以及美国长老会的专科学校。然而，直到一九二五年我十九岁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得救。我很懂基督教，因为我生在基督教，长在基督教，也在基督教里受教育。我的母亲虽然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却为基督教热心。每个主日，她会将孩子们打扮整齐，带我们去听道，参加南浸信会的主日学。每晚在我们上床睡觉之前，她会跟我们讲一些圣经故事。因着我的家庭，我绝对赞同基督教，虽然我是到了以后才相信基督。当我还是个青少年，每逢有人说基督教的坏话，我都会起来辩驳。靠着主的怜悯，我于一九二五年得救，开始深深的爱上主和圣经。得救后的五十四年间，我几乎天天在主的话上花工夫。主保守我在祂的话里。我这个初信者因着宝爱圣经，就用自己所有的钱去买属灵书报。在我的家乡，有一分刊物叫作『晨星报』，是由一位英国传教士所出版。我特别享受里面由一位名叫倪柝声的人所写的文章。我阅读他的文章，得知他是一位特出的信徒。我以为他必定是个上了年纪的教师，至少年过六旬，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和经历。因为欣赏他的文章，我开始与他通信，这才得知他是个青年人，不过比我大两岁。这事实使我非常惊奇，也使我得着激励。知道一个青年人能毅有深的经历，并且为主所用，这件事非常鼓励我。在我写给倪弟兄的信中，有几个问题连同他的回答，出现在他的期刊『基督徒报』上。比方有一次我问他，那一本书最能帮助我逐字明白圣经。我下定决心要更深的认识圣经。倪弟兄在『基督徒报』中回答，照他所知，最好的解经书是达秘所着的圣经略解(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)，但他豫先指明，这本书必须读三、四遍才能领会。借着这样的通信来往，倪弟兄和我开始彼此认识。我在家乡的公会中并没有得着属灵的帮助。不但如此，我读了倪弟兄的刊物，便知道公会的错误。我虽然才二十一岁，但我很认真的寻求主，对真理也有一些认识，因此我所在的公会开始请我讲道。一年后，领头人选我作董事。然而，因着我从倪弟兄著作的亮光得了帮助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不能接受这个职位，并且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正式退出公会。

那时我已经开始参加当地一个弟兄会的聚会，是属于牛顿那一派的。弟兄们非常严谨，对圣经也有许多认识，不过关于生命、那灵、召会的认识不多。我从他们学了许多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豫言和豫表。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，七年半之久，我每周至少参加五场他们的聚会。因着我实在寻求圣经中的真理，每场聚会都记了许多笔记，一场聚会都不错过，甚至天气严寒时也不例外。我非常欣赏弟兄们的聚会，但在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某一天，我走在街上时，主突然从里面对我说话，使我领悟我虽然爱圣经，也得着许多知识，我在属灵上却死沉、不结果子。弟兄们帮助我不爱世界，但我没有领一人归主，并且里面是死的。主给我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后，我吃不好也睡不好。隔天一早，我就走到我家附近小山的山顶，流泪向主呼喊，求祂救我脱离死沉与不结果子。有几个月，我每早晨都上山，这样迫切向主祷告。在那段时间，人发觉我不想说话。我对甚么都没有兴趣，只想祷告接触主。我为着那个经历感谢主。借着那时的祷告，我开始被主充满，变得更活、更寻求主。倪弟兄于那年九月在上海安排了一次特会。因着我们保持通信，我得知这次特会并且报名参加。我要动身搭船前往上海那天，日军入侵东北的消息传来。因为我的家乡烟台靠近东北，众人都说现在出远门是不智之举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入侵会带来甚么后果。因此，我很遗憾的取消了那次行程。早先我所在的公会中，有位跟我年纪相同的青年弟兄来找我，问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。我就给他几本倪弟兄写的小册。那个青年弟兄读了其中一本关于得救证实的小册，就清楚自己得救了。当他任职的公司派他前往上海时，他问我到那里该找谁交通。我建议他去找倪弟兄。后来，他成了上海最初的三位长老之一。一九三二年一月，日军进攻上海。因着战事，上海变为一片废墟，这位弟兄也不得不回到烟台。我见到他很喜乐，他告诉我在上海与倪弟兄一同聚会有多么好。我建议他邀请倪弟兄访问烟台，他同意了。我们说服先前离开的那个公会的领头人，邀请倪弟兄向他们的会众讲道。虽然我们离开了那个公会，但因着领头人尊重我们，他们就同意邀请倪弟兄。我同时写了一封信亲自邀请倪弟兄，鼓励他前来。那年夏天倪弟兄来到烟台，那是我们通信七年之后头一次会面。他住在我家，我们有绝佳的交通。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借着当时与他的接触，我开始在经历上认识基督、那灵、生命，也开始看见召会。

倪弟兄离开那天，一位弟兄（我离开的那个公会的董事之一）前来找他寻求帮助。但倪弟兄已经离开，所以那位弟兄就与我交通。我们走在海边，他突然要我为他施浸。施浸之后，我们都大得鼓励。他决定不再在公会聚会，开始与我聚集。那是烟台召会的开始。两天后，因着我的见证，我工作上的两位同事也受了浸。三天后是主日，又有其他人加入我们。再过一周，共有十一位弟兄一同聚集擘饼。有些姐妹想要加入我们，但因着空间有限，我们就请她们稍待，等我们有更大的地方再来参加。那是一九三二年七月。年底时，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作会所，大约有五十人与我们一同聚集。一九三三年春天，召会已有近百位聚集。倪弟兄听见这个消息，那年就前来印证并加强我们走主恢复的路。他住在我家约有十天。那是我第二次与他相处。那年夏天，倪弟兄前往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美国访问弟兄会。他受到弟兄们欢迎，在纽约一场至少有两千人的聚集中说话。

李弟兄蒙召事奉

一九二五年我得救那天，走在街上时，清楚感觉到主呼召我奉献一生，不惜任何代价传扬福音。当时我是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学生。然而，因着主清楚的呼召，我那天就下定决心，向主宣告我不在乎世界，我要放下一切，传扬福音。然而，因着我的事业和家庭责任，几年之后，我仍然没有信守自己的承诺，答应主的呼召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我家乡烟台的召会圣徒人数已增长至超过一百。我一周至少需要讲四篇信息—主日两篇，周二、周四各一篇。我当时在一家大公司上班，时间相当有限。后来主题醒我，我还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，放下一切，全时间事奉祂。我向主承认，要放下职业，我的信心不彀，因为我的职业是家中可靠的收入来源。八月的头三周，我都在这件事上与主摔跤，之后我感觉自己无法这样下去，就将我的事告诉烟台召会的另外两位领头弟兄。他们答应当天晚上要为我放下属世职业全时间事奉主祷告。

我离开之后，在祷告中到主面前，祂斥责我说，『不要跟我说这件事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。你要不要放下职业都可以，但你若不接受我的旨意，我与你就到此为止。』结果我无法祷告下去，我含泪告诉主，我要放下职业事奉祂。隔天早上另外两位领头弟兄也印证这是主的旨意，我应该离开职业，用全部的时间事奉主。当天我就向公司的总经理递出辞呈，告诉他我辞职并非有更高待迈的工作，而是因为主呼召我事奉祂。总经理是欧洲人，有基督徒的背景，就因为这理由接受了我的辞呈。隔天我收到一封信，来自东北一处规模很大的长老会的长老和执事，他们邀请我去访问，给与属灵的帮助。我这个缺少信心的青年人，才刚受主困迫辞去了工作，就接到这封信，使我大受鼓励。隔天我就告诉我的经理，我必须请假三周前往东北，但是我承诺会回来，再留一个月，把一切都交代清楚。他答应了，我就去了东北。结果，东北的第一处地方召会因此建立起来。我在那里为二十多人施浸，包括一些长老和执事。我还在东北时，经理寄来一封信，要我留在公司，承诺给我升迁、加薪。我也考量若是多留在公司几个月，到了年底，照着新增加的薪水，我可以得到一大笔红利。在拿到这笔红利前离开，似乎很愚昧。这是仇敌的试诱。当我从东北回到家，家中只收到一封信。那是倪弟兄寄来的短信，上面写着：『常受弟兄，关于你的前途，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？愿主引导你。』信上的日期是八月十七日，正是我为着这件事与主摔跤的三周当中。我非常震惊，因为我不曾与倪弟兄说到或写到我当时的经历。我流泪告诉主，我会遵守我的决定，立刻开始全时间事奉主。隔天我告诉经理，我无法接受他的题议留在公司。在接到倪弟兄那封印证的短信之后，我觉得必须去上海一趟，问他怎么会写这封短信。当我在他家作客时，有一天我问他这件事。他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解释说，当时他正从欧洲返回中国，船航行在地中海上。有一天他在船舱里，有负担为主在中国的恢复祷告。他祷告时，主告诉他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应该全时间事奉主。因着当时交通运输及信件寄送耗时甚久，我到九月底才收到信，当时我正受试诱要回去工作。当我听倪弟兄讲到他写那封信的见证时，我领悟他实在是个属神的人——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除此以外□我无法解释他在千里之外，在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情况下，当我身处特别的环境时，如何能寄来那封信，应付了我特别的需要。

倪弟兄的信和东北那处公会团体的信（那是我头一次应邀去外地尽职）是很强的印证，说出放下工作是主纯全的旨意。倪弟兄那封信的原委和内容，使我敬重他到了极点。

李弟兄在中国、台湾、东南亚和美国的劳苦

我留在倪弟兄那里三个月之后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他和上海的同工们觉得我应该带着家眷搬到那里，与他们一同作工。他要我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，看主怎么引导。当我在祷告中到主面前去，祂将使徒行传这卷书向我开启，启示祂在地上的行动总是一。在使徒行传中有一道流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，再到小亚细亚，最后到了欧洲。结果，虽然我在华北已经开始为主作工，在那里也有许多机会，我却觉得自己必须加入上海的弟兄们，好汇成一道流。我领悟若主的旨意是要我在北方劳苦，流就会转向北方。我告诉倪弟兄，我觉得主引导我加入在上海的工作，并且要移居那里一段时间。在那段期间，我学到许多关于基督、那灵、生命、召会的事。我从来没有迈过其他人像倪弟兄那样，对这些事有那么深的认识。一九三七年，日本侵略中国，我收到家乡烟台的长老传来的电报，催促我赶快回去照顾我的家人。因着战争，我一到那里就离不开了。一九四二年，烟台有了一次大复兴，因着那个复兴，日本军队拘禁了我一个月。之后，我病得非常严重，必须休息两年。当战争结束时，上海的弟兄们请我带着家人回去。在那里，倪弟兄和我有更多时间在一起。一九四八年，他恢复尽职，开始办训练。然而中国的政治情势突然改变，共产党取得了政权。倪弟兄召开了两次紧急的同工聚会，会中宣布，他坚决定意要差遣我出国。然而，其他人可以照着他们的感觉留下，牺牲自己。一九五二年，倪弟兄下监，直到一九七二年离世。

我顺从倪弟兄的话前往台湾，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工。主非常祝福祂在台湾的恢复。经过大约五年，聚会的圣徒人数从三百成长到两万。我开始访问东南亚的几个国家，在那里劳苦。一九五八年，我访问了美国、英国和丹麦。一九六〇年，我第二次来到美国。一九六一年，我第三次来的时候，主不让我离开，直留到次年。那时我就清楚，远东有许多召会，工作也已建立起来了，我不该坚持只在那里作工。主告诉我，我需要拿起负担，为着祂在美国的恢复劳苦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，我们在洛杉矶开工。那是主恢复的职事在这个国家的开始。

主恢复所遭遇的反对与主恢复的延续

我的家乡烟台是个小城市，因此那里的基督徒都知道其他基督徒中间发生的事。因着人尊重我是个爱主、追求主的青年人，我还念专科时，就应邀在基督教学学校和医院中讲道。然而，当地方召会在烟台兴起时，公会的基督徒切断了他们与我的接触。之前他们还会安排交通工具，接我去他们的团体中讲道，但这件事之后，他们在街上甚至不跟我打招呼。这种情况开始困扰我，一九三三年春天，我为此挣扎了三十天，直到倪弟兄来探访我们。我对主说，『我爱你，我爱所有信你的人。为甚么这么多人只为了地方召会的立场，就切断与我的交通，甚至在街上连礼貌性的招呼都不打？』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书房走来走去，思考这事。至终我得到结论，按圣经中的真理，我要作人，就必须相信主耶稣，不然我的人生就是虚空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要作基督徒，就必须走地方召会的路，不然我的基督徒生活就没有意义。得到这个结论后，我告诉主：『作人就要作基督徒，作基督徒就要走召会的路。我要作基督徒，我也要走召会的路。』在主的光中，我逐渐清楚这是对的。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六年，我从来没有后悔作了那个决定。次年，一九三四年，我住在倪弟兄家，当时他还单身。他的母亲和其他年长圣徒都催促他结婚。他同意结婚，条件是他们会请我作他的伴郎。他们联络我时，我觉得很荣幸，很快就答应了。婚礼之后，有风波兴起，反对倪弟兄婚姻的事。既然我是伴郎，就必须承担责任，应付那个风波。

回想这事，倪弟兄可能豫料到会有风波，才要求我作他的伴郎。当时他三十一岁，我二十九岁。在风波之中，有一天我对他说，『倪弟兄，我想向你表明。你知道我们之间没有天然的情感。我跟随你，绝对接受你的话，只因为我晓得你是跟随主在这时代的路。其实我不是跟随你，而是跟随主的路。只要你走主的路，我就会敬重你是领头人。然而，你若离开这条路，我还是要走这条路。』我们不是跟随任何人、任何实行、任何道理，而是跟随主在这时代的恢复。我很喜乐，主的恢复在美国已经种在许多圣徒里面。我完全确信，就算我放弃这条路，许多圣徒还是会忠信的走下去。因此我并不担心反对的攻击。这些攻击无法消灭主的恢复。这是主的恢复，就是要恢复基督、那灵、生命、亮光、真理和召会。我在美国劳苦这十七年间，只传讲这六件事。只要我们有这六件属于主的事，就没有人能消灭这恢复。主的恢复正在往前。纵使中国的众召会在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后被迫关闭，有些东西至终会再兴起，因为主恢复的种子已经种在那里了。这种子也已经种在北美，会有许多人不顾一切，忠信的走主恢复的路。这是主在这个时代独一的路。